



# 中国大革命与亚洲

EYES ON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ASIA

主 编 吴祖明

副主编 曾成贵  
田锦富

中国档案出版社

## 目 录

充分发挥史学功能 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在“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 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胡家祥(1)
用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促进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 ——在“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 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邓剑秋(5)
在“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 吴祖明(9)
中国国民革命与亚洲民族的复兴 ..... 董立仁 王皓(13)	
国民革命——亚洲革命的升华 ..... 徐方治(20)	
神州的觉醒 亚洲的崛起 ..... 王健民(28)	
“斯内夫利特战略”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 ..... 毛磊 黎鹤(36)	
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 ..... 沈予(44)	
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外交统战工作与国际社会的反响 ..... 陈国清(58)	
从“退款兴学”剖析大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文化政策 ..... 吴明堂(64)	
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探析 ..... 郑自来 彭捷(71)	
武汉国民政府演变的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兼论武汉国民政府解体的历史必然性 ..... 赵春旸(77)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蒋介石的斗争 ..... 徐莉君(89)	

论北伐的分期及“四·一二”后的北伐	熊宗仁	(95)
试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南方政权的劳动立法	饶东辉	(105)
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时期的劳资纠纷	陈芳国	(114)
湖北农民运动与亚洲	陈乃宣	陈国清(124)
大革命时期湖南、湖北两省农民运动之比较研究	谭克绳	(131)
国民革命时期的西山会议派	苏维初	(138)
国民革命时期国家主义派的政治活动与观念	李承佑	(153)
略论北伐战争时期的中央银行	徐凯希	(163)
非基督教运动与中国大革命	田锡富	(175)
2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批判		
——《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个案研究	徐有威	(189)
中华民族感情与国共首次合作	陈奇文	(199)
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三党与国民党改组派	周伟嘉	(207)
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是怎样认识陈独秀在农民		
问题上的错误的	雷国珍	(219)
论北伐时期邓演达的外交策略	肖燕明	(225)
论北伐时期加伦将军的政治主张	谈 方	(232)
孙中山国民革命口号提出的历史考察	刘曼容	(239)
民国时期孙中山武装斗争述论	田子渝	(246)
孙中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	张同新	(255)
评罗易在武汉的理论与实践	刘继增	王列平(268)
黄埔军校内部的国共对立与蒋介石的思想倾向		
——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		
及蒋介石的反应	裴京汉	(279)
论北伐与蒋介石	杨 菁	杨树标(291)
北伐时期恽代英在军校的实践和理论建树	曾成贵	(302)
北伐战争时期董必武的军事统战艺术	徐晓林	(314)
编后记		(323)

## 充分发挥史学功能 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在“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 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胡家祥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日)

各位代表：

“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经过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和几家协办单位的共同努力，今天在这里开幕，这是我省社会科学界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迎来的一件盛事。我代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与会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70年前，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了气势磅礴的北伐战争。在北伐战争进军的凯歌声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于1926年12月13日在武汉宣告成立，标志着革命阵营的政治中心，由广州迁到了武汉。以武汉为中心，新的革命高潮波澜壮阔，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打击了敌人，锻炼了革命队伍。今天，各位代表围绕“中国大革命与亚洲”这个主题，将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根据全面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要求，科学地把握

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从战略上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作了部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核心在于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它的重点在于加强教育，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21世纪中国的面貌，归根到底取决于广大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这项任务的完成，必须始终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充分发挥史学功能，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首先一点，就是用我们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现代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历来是我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在当代中国，它是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一部中国史，尤其是近代史、现代史，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生动、深刻的教材。就以大革命史为例，“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包含了多少反帝爱国的史实！深入进去，爱国主义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扑面而来。没有爱国主义的支柱，就不会有这些充满浩然正气的壮举。工人罢工的胜利，农民减租减息的胜利，北伐将士在战场上的胜利，都包含和体现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中国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说明了为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西方有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却不能有，说明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也说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斗争中得来的，是人民自己的历史选择。具体事例，当然还可以列举很多。坚持不懈地运用历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加强思想道德的修养。

研究历史从大处着眼，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分析和把握历史事实的本质，科学地总结出经验和教训，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这是充分发挥史学功能，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另一个方面。在大革命阶段，我们党还不成熟，在领导革命斗争中，既出现过“右”的错误，也出现过“左”的错误。这个阶段的实践和理论，对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一直都十分重视对这段历史经验教训的研究和总结，并运用到指导革命和建设中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按照唯物辩证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没有穷尽的，对历史的认识也不会有穷尽。历史事实固然不可改变，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认识工具的更新，完全可以得出新的认识。时代的进步需要历史的指点，我们在探明规律，总结经验，继承前人，借鉴外邦上做出了贡献，就会无愧于时代。

从本世纪 2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主要由国共两党的状况决定着，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对于今天促进海峡两岸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实现和平统一，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明生活的需求也在相应地提高。搞好史学工作，多出高水平的著作，有利于直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还可以间接地为影视、广播、文艺等部门提供素材，有利于这些部门生产历史题材作品，共同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史学工作实际上是与火热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广大史学工作者奉献在岗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完全可以大显身手，大有作为。

我们要充分发挥史学的功能，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关于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思想，都是我们搞好史学工作的重要指南。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史学工作的健康发展就有根本保证。

要充分发挥史学的功能，就必须坚持唯物史观。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使历史学真正成为科学。在当代中国，唯物史观在历史学界居于指导地位，但唯心史观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还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只有自觉地坚持唯物史观，抵制唯心史观的影响，才能使史学工作者沿着正常的轨道前进。

要充分发挥史学的功能，还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要提倡科学、严谨的学风，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切磋。要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对事关政治方向、事关重大原则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毫不含糊。

此外，还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在哲学社会科学中，要防止轻视和淡漠历史学的倾向。要充分发挥老专家、老学者的传、帮、带作用，大力培养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使史学工作队伍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今天，我是特地来向“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道贺的。借此机会，谈了以上几点想法，与大家交流。

祝学术讨论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 用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在“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邓剑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日)

各位代表：

今天，在美丽的风景名胜区东湖之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海内外专家学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代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代表本次会议的各协办单位，对出席“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光临大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大革命以 1924 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建立为开端，以 1927 年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反共而告终结。历时虽不足 4 年，但所形成的广阔的革命高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却是空前的。在这场革命中，各革命阶级组成了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因而也被称作国民革命。从反帝反封建的目标上讲，这场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革命阵营的领导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它又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高潮。一方面，中国大革命得到了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的指导，得到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支持，也得到了西方各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的大革命也支援了苏联和西方各

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支援并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样，它又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革命所具有的恢宏、深刻的内容，决定了它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引人注目，不可替代。早在 30 年代，中国大革命的亲历者、史学界前辈华岗同志，就写出了《1925—1927 年中国大革命史》，为这场大革命树立了一座丰碑。不仅如此，由于大革命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关系至为密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进行的研究，也一直没有间断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大革命作过精辟的论述。大革命的历史，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领军、治国的不可或缺的借鉴。

有位外国学者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作为已经过去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即原生的历史，不可改变，也不可复制。但作为记录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即再现的历史，无论是董狐之笔，还是《春秋》之义，都不可避免地渗透了记录者、著作者的主观意识。因此，一代总有一代打着本时代烙印的历史。今天，我们在世纪之交，重新回顾并深入研究 70 年前所发生的大革命，自然会得出许多与前人不同的认识，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既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本身的需要，也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的春风使史学园地得到复苏，新中国建立后逐步开展起来的中国大革命史研究得到恢复，并有很快的发展。1987 年 9 月，国家“六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大革命史 1924—1927》，由武汉、广州和长沙的学者共同完成，标志着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在这前后，大革命史研究在关于国共合作、政权建设、北伐战争、工农运动、中外关系等专题方面，陆续出版了不少著作，呈现出百花齐放

的可喜局面,引起了海内外史学界的重视。

但是,也应该看到,大革命史的研究,与时代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过去的研究,较多地限于政治领域,有些方面至今无人涉及;研究过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的更新、史料的发现,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这次学术讨论会,以“中国大革命与亚洲”为主题,探讨中国大革命在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其它问题,这是以前的讨论会所没有过的,是一个新的拓展。

各位代表,时代要求我们,学术事业也要求我们,进一步把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深入下去。现在,我们也有条件完成这项任务。首先是科研和教学战线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老中青结合的队伍,这从我们这个讨论会就可以得到说明;这支队伍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献身学术,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构筑了坚实的基础;最近几年,各种新的档案资料不断地整理、发布,史料条件有明显的改善;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尤其重要的是,中共十四大确立了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一切工作的指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大革命史,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把握正确的方向。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要求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加强重点学科建设。中国大革命史研究在我省,相对说来是比较有优势的。省委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对大革命史的研究十分重视,多次立项资助。在我院,建院以来就开展了大革命史的研究,如果往上追溯,更可以溯到其前身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时期。1991年,我院还建立了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中心,以本院研究人员为基础,联合省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推进学科发展。这次会议提供给各位代表的《国民革命事典》,就是该中心成立后取得的一项

成果。我们将一如既往，重视大革命史研究的建设和发展，力争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各位代表：唐代大诗人王勃有句名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今天出席讨论会的代表，有不远万里来自海外的，来自国内的也是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进一步深化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聚会于东湖之滨的，希望不仅在这个会上交流，更要在会后保持密切的学术往来，共同把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以丰硕的成果回报社会，服务人民，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由于我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会议准备和安排的不周之处，请各位代表海涵并坦诚相告，我们将及时尽力解决。祝各位代表在大会期间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广交朋友，切磋学术。最后，祝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研究员）

## 在“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 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吴祖明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

各位代表：

经过与会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顺利地完成了既定议程，今天下午就要闭幕了。现在，我代表主办和协办单位，对本次学术活动作一个简短的小结。

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得到了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今年春，省委宣传部批准了我们的请示，同意召开这个会议，并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省政府为会议批拨专项经费。在会议开幕式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家祥同志还作了重要讲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为会议得以顺利举行提供了保证。至于我们主办单位的领导、各协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更是把这次讨论会作为促进学术交流、繁荣学术研究、贯彻落实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的大事来办。

以中国大革命的研究和交流为主要内容的讨论会，建国以来并不多见，而国际性的会议，可能就是这一次。这次会议，与会学者49人，分别来自英国、韩国、日本和国内的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汕头、湛江、南宁、贵阳、南昌、九江、长沙和武汉。收到论文48篇，著作2种。有的学者，包括国内学者和海外学者，因故未能出席会议，仍为会议提交了论文。还由于会议规模的限制，部分学者希望能够赴会的要求也未能满足。这说明，我们这次会议及其主题，在学术界同仁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和关注，这也是对中

国大革命这段历史的纪念和回报。

这次讨论会只安排了两天时间,但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既有会议间的交流切磋,又有会外的参观考察。围绕着“中国大革命与亚洲”这个主题,从中国大革命在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重要人物的生平与活动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过去在研究中比较薄弱的课题,如大革命在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大革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在这次会议上有学者交流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过去研究得比较多的问题,如国共关系、北伐战争等,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这都有利于我们开拓视野,在切磋和交流中加深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以便得到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这是我们这次讨论会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对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化和促进。可以说,大家在这次会上交流的成果,标志着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

各位代表,资治是我国历代学者研究历史的传统。孔子删削《春秋》寓微言大义于其中;司马迁修《史记》立一家之言,还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更把史著定名为《资治通鉴》,表明了他治史的目的。这是由史学的功能和现实的需要这两个方面所决定的。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的经验教训,是现实生活的借鉴,这种借鉴,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有赖于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和总结。今天,我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更需要从各方面得到借鉴,需要史学工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从历史的事实中揭示规律,总结经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我们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大革命的研究,对于加强在人民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对于加强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促进“一国两制”的实现和祖国和平统一

的完成，对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有一种现象，就是对于历史上的社会变革，采取贬损革命、推崇改良的态度，这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研究中国大革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对此，参加这个会议的学者，根据历史的事实作出的答复是：近现代亚洲各国争取民族解放、独立和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尽管各国发展的道路不同，具有自己的国家、民族特色，但人民革命、民族解放斗争是亚洲各国发展进步的动力和主导过程，虽然改良运动曾经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阶段和组成部分，但在当时世界历史条件下，在本国封建统治已经完全腐朽的情况下，改良本身不可能取得胜利，革命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不能把改良运动说成是亚洲各国近现代史发展的主导过程和民族独立解放的主要选择道路，更不能以此贬损革命和把革命斥之为“激进主义”。我们认为，像这样的探讨的研究，有益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也有益于历史研究本身。

研究历史，最高层次的目标是揭示规律。更普遍的、更常见的，则是对具体历史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对于这类问题，我认为应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历史的本身面目就是那个样子，如果能本着正确的态度，就能科学地把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出来。我们这次会议，对于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中外关系、人物生平与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观点，对于一些问题的分析，可能比过去更符合历史实际一些。当然，我们不能期望通过一次学术讨论和交流，就能解决所有的学术问题，或对有分歧的学术问题完全达成共识。这个任务，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长期研究工作中去完成。只要我们以正确的历史观为指导，运用科学的方法，占有翔实的史料，总会得到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学术事业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前进的。

各位代表！70年前，武汉是革命的赤都。我们湖北的学者有责任在大革命史研究中做出更多的贡献。在湖北研究大革命史的队

伍中，我院是其中的一支力量，我们将继续办好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中心，以它为依托，联络省内外、国内外学者，共同把大革命史研究深入下去，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希望海内外学者同我们保持联系，经常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由于我们各方面的条件都有限，会议接待中不足之处难免，恳请大家谅解。会后，各位学者相继踏上归途，祝大家旅途顺利，身体健康，研究有成，事业发达！

现在，我宣布：“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 中国国民革命与亚洲民族的复兴

董立仁 王 峥

20世纪是亚洲民族复兴的世纪。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国民革命，有力地推动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加速了亚洲民族复兴的进程，在亚洲民族复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就此略作粗浅探讨。

## 一、亚洲民族复兴的新起点

亚洲是世界上第一大洲，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但是，由于西方殖民势力的不断入侵，到1894年，整个亚洲“可以说没有一个完整独立的国家”，不是一个个被“消灭”，“便是一个一个”被“压制起来”。虽然在上世纪末，亚洲曾发生诸如中国的戊戌维新运动、印度的国大党运动、伊朗的君主立宪运动和土耳其新奥斯党人的立宪运动等改良主义运动，这些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亚洲民族复兴产生过一些影响，但成效甚微。1894年6月，日本政府首先与英国进而又先后与欧美列强各国修订了不平等条约，改善了其国际地位，“成为了亚洲头一个独立国家”，对亚洲民族复兴亦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日本政府在“民族解放后”，步西方列强后尘，吞并朝鲜，侵略中国，欲称霸亚洲，与亚洲民族复兴背道而驰，实为亚洲民族复兴之反动。1896年菲律宾爆发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独立战争，并宣告成立菲律宾共和国，在亚洲民族复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时过不久，美军侵入，菲律宾再次沦为殖民地。总而言之，上世纪末亚洲一些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甚至包括上

世纪 60 年代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在内),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对唤醒亚洲民族复兴意识起了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为亚洲民族的复兴指明正确道路,更不可能把亚洲民族复兴付诸实现。

本世纪初,1905 年发生的俄国革命,“彻底唤醒了亚洲”,从而使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反对民族压迫斗争扩大化和尖锐化”。这时,除了菲律宾的反美独立战争尚在进行外,先后爆发了伊朗革命、土耳其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这些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程度上带有实现民族解放的要求,而且有一部分工农群众参加,标志着 1905 年后,亚洲民族复兴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但是,由于领导这些国家革命的资产阶级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度里,不敢充分发动农民,不能积极领导农民,不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致使上述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历史证明,亚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尽管进一步激发了亚洲民族的复兴意识,但并不能担负起完成亚洲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强化了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压迫和奴役,亚洲民族复兴运动由低潮走向高涨。1919 年 2 月爆发了阿富汗士兵起义,3 月朝鲜爆发“三一起义”,5 月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其它如印度的保卫“哈里发”反英斗争,土耳其挫败英国支持的希腊军队的入侵,都是亚洲民族复兴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土耳其获得的独立,使亚洲半殖民地各国人民深受鼓舞。

但是,亚洲民族复兴的道路远非平坦,华盛顿会议后,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建立起旨在镇压亚洲各民族解放斗争的“神圣同盟”,印度的“不合作运动”和中国的“二七”大罢工均遭镇压,土耳其基马尔政府转向美、英帝国主义,对工农反目为仇,亚洲民族复兴又一次跌入深谷。

然而,也就在此时,中国的国民革命异军突起,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亚洲民族复兴运动的崭新起点,其主